

13—16 世纪欧洲文献中的马穆鲁克观念

梁有源 闫 伟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5)01—0045—13

13 世纪中期, 欧洲学者出于发动十字军东侵的意图, 展开了针对马穆鲁克王朝 (Mamluk Sultanate)^① 的研究。作为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者, 马穆鲁克 (mamlūk)^② 成为欧洲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自第七次十字军东侵 (1248—1254) 开始, 欧洲学者在两个多世纪中通过经商、旅行、朝圣等方式在叙利亚^③ 和埃及收集了大量有关马穆鲁克的信息, 进而逐步构建出一套较为完整的马穆鲁克观念。

然而, 这些信息不仅零散分布于 13—16 世纪各类欧洲文献, 而且并未得到学者们的足够关注。国外学界对此主要关注某一类型或个别学者的著述。例如,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哈尔曼 (Ulrich Haarmann) 以这一时期的游记类作品为基础, 并认为马穆鲁克王朝后期出现了“马穆鲁克化” (Mamlukization), 其中非马穆鲁克精英的权力逐步削弱, 而素丹和皇家马穆鲁克 (al-mamālīk al-sultānīyah) 的权力则得以增强。^④ 美国学者汉娜·巴克 (Hannah Barker) 以十字军战略类著述 (Recovery of the Holy Land) 为核心, 重点关注了十字军战略与马穆鲁克贸易的关系。^⑤ 以色列学者科比·约瑟夫 (Koby Yosef) 从社会学角度重点分析了阿诺德·冯·哈

[收稿日期] 2024-06-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 (编号: 19JZD043)。

[作者简介] 梁有源,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东史; 闫伟,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东史。

- ① 马穆鲁克王朝是 1250 至 1517 年间在西亚北非地区由军事奴隶贵族建立的政权, 其领土范围囊括当时的埃及、大叙利亚 (Greater Syria)、努比亚 (Nubia) 和希贾兹 (Hejaz) 等地。
- ② 马穆鲁克即“军事奴隶”, 该词源于阿拉伯语的动词词根 m-l-k, 意为“拥有的东西”。
- ③ 本文所述“叙利亚”和“叙利亚地区”特指地理上的“大叙利亚地区”, 即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等国家或地区, 地处小亚细亚与阿拉伯半岛和伊拉克、埃及之间。参见王新刚等著:《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第 1 页。
- ④ 皇家马穆鲁克即素丹的马穆鲁克, 他们是马穆鲁克素丹维持其统治的重要保障, 亦是马穆鲁克军队中地位最高的马穆鲁克。Ulrich Haarmann, “The Mamluk System of Rule in the Eyes of Western Travelers,” *Mamlūk Studies Review*, Vol. 5, 2001, p. 22.
- ⑤ 十字军战略类著述直译为“收复圣地” (recuperatio Terrae Sanctae), 是中世纪晚期关于十字军基督教文学中的一种体裁, 具体包括如何为基督教收复圣地的论文和备忘录, 最早出现于 1274 年里昂第二次大公会议。

尔夫 (Arnold von Harff, 1471—1505)^① 的著述, 并指出了其中表现出的马穆鲁克与其亲属的关系。^② 上述研究多聚焦于某一类型或个别学者的著述, 在时间上集中于 14 世纪末的著述, 不仅未将整个马穆鲁克王朝时期欧洲学者的著述视为整体加以审视, 也没有就这些文献中所体现的马穆鲁克观念进行系统性分析。国内学界对此研究则几无学者涉猎。

基于此, 本文以 13—16 世纪欧洲有关马穆鲁克的编年史、书信、游记等原始文献为基础, 按时间顺序梳理欧洲文献中马穆鲁克观念的变迁, 进而对其构成和原因进行分析。

一、欧洲文献中马穆鲁克观念的变迁

十字军与马穆鲁克的接触始于第七次十字军东侵。1249 年 6 月, 法王路易九世 (Louis IX, 1226—1270 年在位) 率十字军占领埃及达米埃塔 (Damietta) 后兵锋直指开罗, 阿尤布王朝素丹萨利赫·阿尤布 (Salih Ayyub, 1239、1240—1249 年在位) 却在此时病逝。他的遗孀莎彻尔·杜尔 (Shajar ad-Durr, 1250 年在位) 通过丈夫生前建立的伯海里系 (Bahri)^③ 马穆鲁克军团的支持稳住政局, 之后秘不发丧, 直至其子穆阿扎姆·图兰沙 (Al-Mu'azzam Tūrān-Shāh, 1249—1250 年在位) 自哈桑凯伊夫 (Hasankeyf)^④ 返回开罗。与此同时, 马穆鲁克在与十字军的交战中大获全胜, 俘虏了包括法王在内的大量十字军贵族, 马穆鲁克自此作为新的威胁引发了欧洲学者的担忧, 并逐渐开启了对马穆鲁克的认知过程。

(一) 13 世纪中期至 14 世纪初欧洲文献中的马穆鲁克观念

13 世纪中期至 14 世纪初是马穆鲁克王朝与十字军相互攻伐的交战期, 马穆鲁克在此期间以恐怖好战的形象进入欧洲学者的视野。彼时的十字军对马穆鲁克知之甚少, 欧洲学者或是将马穆鲁克与其他阿拉伯穆斯林混为一谈并称之为“萨拉森人” (Saracens)^⑤, 或是按照族群将其视为“突厥人” (Turks)。作为第七次十字军东侵的亲历者, 法国历史学家让·德·茹安维尔 (Jean de Joinville, 1224—1317) 就在《圣路易传》 (Life of Saint Louis) 中混用了上述称谓。^⑥

Hannah Barker, *That Most Precious Merchandise: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in Black Sea Slaves, 1260–150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2019, pp. 186–208.

① 阿诺德·冯·哈尔夫出生于科隆, 曾于 1496—1499 年间前往叙利亚和埃及等地旅行。

② Koby Yosef, “Mamluks and Their Relatives in the Period of the Mamluk Sultanate (1250–1517),” *Mamlūk Studies Review*, Vol. 16, 2012, pp. 55–70.

③ 伯海里系起源于萨利赫·阿尤布招募的马穆鲁克, 以突厥人和蒙古人为主, 因驻守在尼罗河中的劳达岛 (al-Rawda) 而得名“伯海里” (即“河州”之意)。马穆鲁克王朝后期的布尔吉系则源自盖拉温 (Qalāwūn, 1279—1290 年在位) 在位期间招募的马穆鲁克, 以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为主, 因驻守在开罗城堡而得名“布尔吉” (即“碉楼”之意)。参见彭树智主编:《中东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 第 146 页。

④ 哈桑凯伊夫属于今土耳其东南部的巴特曼省 (Batman), 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

⑤ 萨拉森人也称撒拉逊人或撒拉森人, 该词是十字军对阿拉伯穆斯林的称呼。与此相对, 西亚地区的穆斯林则称来自欧洲的十字军为“法兰克人” (Franks) 或“拉丁人” (Latins), 用以区别于被称为“希腊人”或“罗马人”的拜占庭基督徒。

⑥ 茹安维尔生于法国香槟的贵族家庭, 其代表作《圣路易传》记录了法王路易九世的生平和第七次十字军东侵的经过。参见 Jean de Joinville, Geoffroy de Villehardou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 trans. Caroline Smith,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p. 184.

除此之外,马穆鲁克强悍的军事实力也给十字军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部分十字军也察觉到“萨拉森人”似乎不同于以往。据《罗瑟琳续集》(*Rothelin Continuation*)^①记载,这些“萨拉森人”“以如此多的方式、如此持续、可怕和猛烈地攻击我们……他们简直不是人,而像野兽,因愤怒而发狂。”^②

十字军败退欧洲后,才渐渐地发现所谓的“萨拉森人”只是一群奴隶。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 1243—1254 年在位)据此认为基督教世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他在 1251 年为阵亡十字军贵族举行布道时将马穆鲁克贬为“充满所有邪恶的魔鬼奴隶”。^③与此同时,开罗政局发生更迭,伯海里系马穆鲁克埃米尔(emir)^④在图兰沙继位仅 6 个月后将刺杀,继而建立了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此事被叙利亚的十字军获悉后报知欧洲,马穆鲁克除“奴隶”的标签外又增添了“弑主篡位”的恶名。条顿骑士团团长科布伦茨的彼得(Peter of Coblenz)在 1254 年写给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Alfonso X, 1252—1284 年在位)的信中专门提及此事。^⑤但即便如此,欧洲学者仍未意识到埃及的王朝更迭,只是将此视为“萨拉森人的一次严重不合”^⑥。

1260 年,马穆鲁克王朝在艾因·扎鲁特战役中击败了蒙古人的入侵,并且自拜伯尔斯(Baybars, 1260—1277 年在位)继位后开始全力进攻叙利亚的十字军国家。及至 1291 年,十字军最后的据点阿克(Acre)终为哈利勒(Khalil, 1290—1293 年在位)收复。阿克的沦陷是十字军东侵的重要事件,它不仅标志着叙利亚地区最后的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的覆灭,更意味着绵延近 200 余年的十字军东侵在叙利亚地区的终结。正因如此,马穆鲁克最终被冠以“基督徒最邪恶的敌人”^⑦。

1291 年后,欧洲十字军已无力再度涉足叙利亚和埃及,但仍有部分学者心心念念地再次掀起新的东侵以“收复圣地”。14 世纪初,欧洲学者开始以书面形式向教皇和法王提议,继而形成了一批有关十字军战略的著述。这类著述的核心观点是对埃及实施贸易禁运从而削弱其国

① 《罗瑟琳续集》是一部匿名古法语散文史,现名称得名于其曾经的手稿拥有者,一位名叫查尔斯·德·奥尔良·德·罗瑟琳(Charles d'Orléans de Rothelin, 1691—1744)的法国神父,该书大约成书于 1261 年之后,共 82 章,涵盖 1229—1261 年的十字军史。

② Malcom Barber, Bernard Hamilton, Norman Housley and Peter Edbury, eds., *Crusader Syria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Rothelin Continuation of History of William of Tyre with part of the Eracles or Acre text*, trans. Janet Shirley, Aldershot: Ashgate, 1999, p. 98.

③ Penny J. Cole, *The Preaching of the Crusades to the Holy Land, 1095–1270*, Massachusetts: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91, p. 236.

④ 埃米尔是马穆鲁克王朝军事体系中的重要官员,埃米尔在马穆鲁克军事体系和伊克塔制度中的含义特指军官(military officer),在行政体系中指马穆鲁克出身的行政官员。

⑤ Malcolm Barber and Keith Bate, eds. and trans. *Letters from the East: Crusaders, Pilgrims and Settlers in the 12th–13th Centu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152.

⑥ Malcom Barber, Bernard Hamilton, Norman Housley and Peter Edbury, eds., *Crusader Syria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Rothelin Continuation of History of William of Tyre with Part of the Eracles or Acre Text*, trans. Janet Shirley, p. 109.

⑦ Malcolm Barber and Keith Bate, eds. and trans. *Letters from the East: Crusaders, Pilgrims and Settlers in the 12th–13th Centuries*, p. 163.

力,欧洲学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揭开了马穆鲁克的真相。事实上,关于贸易禁运的提议早在1291年就曾出现,帕多瓦的费迪乌斯(Fidentius of Padua,生卒年不详)在《论收复圣地》(*Liber recuperationis Terrae Sanctae*)一文中就有所提及。^①至1305年,帕尔马的方济各会修士拉蒙·柳利(Ramon Llull,约1232—1315/1316)基于费迪乌斯的论述明确指出,马穆鲁克并非萨拉森人,而是萨拉森人从希腊买来的鞑靼人或突厥人奴隶。^②

不久后,威尼斯学者马里诺·萨努多(Marino Sanudo,约1270—1343)^③在向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II,1316—1334年在位)递交的《十字架信徒的秘密书》(*Liber Secretorum Fidelium Crucis*)中,对马穆鲁克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他认为,马穆鲁克是埃及素丹和埃米尔通过其代理人在黑海地区购买的基督徒和异教徒男童,“他们教导这些孩子,让他们学习军事,正是这些孩子在埃及和素丹统治下的土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保护并守卫着这片土地”^④。相比之下,亚当的威廉(William of Adam,约1275—1338/1389)^⑤在1316—1317年著成的《如何打败萨拉森人》一书中虽然赞同萨努多的观点,但却将矛头指向热那亚人。在威廉看来,马穆鲁克大都是由“伪基督徒”卖给素丹的奴隶,而“伪基督徒”中最恶劣者当属热那亚人塞古拉诺·萨尔维戈(Segurano Salvaygo),仅他一人就将一万名男童卖给了素丹。^⑥

(二) 14世纪中期至16世纪初欧洲文献中的马穆鲁克观念

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的爆发迫使法王腓力六世(Philip VI,1328—1350年在位)取消了与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327—1337年在位)共同发动十字军的计划,罗马教皇的权威随后也因阿维尼翁之囚遭到严重削弱。此后,欧洲的十字军运动更加衰微,欧洲学者的十字军战略类著述也逐步减少,其对马穆鲁克的记载转移至纪实性较强的游记类作品。

1336—1341年,德意志教士鲁道夫·冯·苏切姆(Ludolph von Suchem,生卒年不详)^⑦在朝圣期间与马穆鲁克有了近距离接触。据他观察,马穆鲁克在族群上大都是突厥人而非阿拉伯人,^⑧宗教上则是基督徒的“叛徒”(renegades),他们因为各种“诱惑”而“堕落”为马穆鲁克。例如,苏切姆曾在希伯伦(Hebron)遇到了三位来自明登(Minden)^⑨的德意志马穆鲁克。

① 费迪乌斯是一位活跃于1266—1291年的圣方济各会牧师,他曾在1274年参加第二次里昂会议,并受教皇格里高利十世(Gregory X,1271—1276年在位)之托撰写了《论收复圣地》。Hannah Barker, *That Most Precious Merchandise: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in Black Sea Slaves, 1260–1500*, p. 192.

② 拉蒙·柳利是加泰罗尼亚著名历史学家、逻辑学家、神学家。Hannah Barker, *That Most Precious Merchandise: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in Black Sea Slaves, 1260–1500*, p. 19.

③ 马里诺·萨努多出生于威尼斯贵族世家,曾经在叙利亚、希腊、埃及等地旅行,后供职于巴勒莫宫廷。

④ Marino Sanudo, *Marino Sanudo Torsello, The Book of the Secrets of the Faithful of the Cross*, trans. Peter Loc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56.

⑤ 亚当的威廉是一位出生于法国南部的多明我会修士,生平不详。

⑥ William of Adam, *How to defeat the Saracens: Guillelmus Ade, Tractatus quomodo Sarraceni sunt expugnandi Text and Translation with Notes*, Washington: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12, p. 35.

⑦ 苏切姆是神圣罗马帝国帕德博恩(Paderborn,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教区教士,曾于1336—1341年前往叙利亚朝圣。

⑧ Ludolph von Suchem, *Ludolph von Suchem's Description of the Holy Land, and of the Way Thither*, trans. Aubrey Stew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3, p. 30.

⑨ 明登位于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地处德国西北部。

“当问及他们为什么放弃信仰时，对方回答说，他们希望能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获得财富和荣誉，但他让他们失望了……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愿意偷偷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他们正过着一种最悲惨的生活。”^①

步入 15 世纪后，欧洲学者对马穆鲁克的记述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增加，而且一些著述还突破了对于现象的描述，出现了部分解释性的观点。锡耶纳（Siena）学者贝特朗多·德·米尼亚内利（Bertrando de Mignanelli, 1370—1455/1460）^②在《伯尔古克传》（*Ascensus Barcoch*）中回顾了马穆鲁克素丹伯尔古克（Barquq, 1382—1389、1390—1399 年在位）从奴隶到统治者的过程，他称伯尔古克曾是一位基督徒，只是半心半意地改宗了伊斯兰教，^③伯尔古克不仅对基督徒非常友善，而且是抵抗帖木儿（Timur, 1370—1405 年在位）入侵的英雄。^④威尼斯学者伊曼纽尔·皮洛提（Emmanuel Piloti, 约 1397—1441）曾长期在亚历山大居住，他特别强调了埃及的社会分裂，并认为马穆鲁克王朝由科普特人、阿拉伯人及马穆鲁克组成，但这三类人彼此严重不和，马穆鲁克作为从基督教土地上购买的奴隶统治着前两类人。^⑤

1436—1439 年，卡斯蒂利亚学者佩德罗·塔富尔（Pedro Tafur, 1410—1484）觐见马穆鲁克素丹伯尔苏贝伊（Barsbay, 1422—1437 年在位）商谈塞浦路斯王国（Kingdom of Cyprus, 1192—1489）的贡赋问题。^⑥在船队停靠卡法（Kaffa）^⑦期间，塔富尔震惊于当地庞大的奴隶市场，并且目睹了马穆鲁克贸易的全部经过。^⑧在他看来，马穆鲁克是“变成摩尔人（Moors）^⑨的基督徒叛徒”，除非某人是“叛徒”，否则他不能拥有任何特权，“叛徒”的子孙们也不能享受

① Ludolph von Suchem, *Ludolph von Suchem's Description of the Holy Land, and of the Way Thither*, trans. Aubrey Stewart, p. 92.

② 米尼亚内利是锡耶纳贵族之子，曾周游东地中海地区，并于 15 世纪初居住在大马士革。他懂得阿拉伯语且与伯尔古克相识，他在 1416 年返回锡耶纳后完成了《伯尔古克传》，该书除作为素丹传记外，亦是关于帖木儿征服大马士革的唯一拉丁文原始资料。

③ Walter J. Fischel, “*Ascensus Barcoch* (I) A Latin Biography of the Mamlūk Sultan Barqūq of Egypt (D. 1399) Written by B. de Mignanelli in 1416: Rendered into English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 Commentary,” *Arabica*, Vol. 6, No. 1, 1959, p. 64.

④ Walter J. Fischel, “*Ascensus Barcoch* (II) A Latin Biography of the Mamlūk Sultan Barqūq of Egypt (D. 1399) Written by B. de Mignanelli in 1416: Rendered into English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 Commentary,” *Arabica*, Vol. 6, No. 2, 1959, pp. 166–169.

⑤ Emmanuel Piloti, *L'Égypte Au Commencement du Quinzième Siècle d'après le traité d'Emmanuel Piloti de Crète (incipit 1420)*, Cairo: Imp. Université Fouad Ier, 1950, p. 11.

⑥ 十字军败退大叙利亚地区后，统治耶路撒冷王国的吕西尼昂（Lusignan）家族以塞浦路斯为基地继续在地中海地区从事海盗活动。伯尔苏贝伊继位素丹后于 1424—1426 年派遣海军征服塞浦路斯并俘虏塞浦路斯国王雅努斯（Janus, 1398—1432 年在位）。战后，塞浦路斯王国被迫每年向马穆鲁克王朝缴纳大笔贡赋，塔富尔此行正是为在两国之间斡旋，以减轻塞浦路斯王国的贡赋。

⑦ 卡法位于今克里米亚半岛的费奥多西亚（Feodosia），13 世纪为热那亚人的殖民地。同时，卡法也是马穆鲁克王朝黑海奴隶贸易重要节点，马穆鲁克王朝长期在卡法购买奴隶。

⑧ Pedro Tafur, *Pero Tafur: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trans. Malcolm Letts, Boston and New York: Gorgias Press, 2007, pp. 132–133.

⑨ 摩尔人指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撒丁岛、马格里布等地的穆斯林。

父辈的荣耀,而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扩大穆斯林的数量。^①

塔富尔的记述后来得到了德意志学者约翰·施尔特贝格(Johann Schiltberger, 1380—1440)^②的佐证,他将马穆鲁克素丹称为“国王—素丹”(king-sultan),并认为他是所有穆斯林的首领,而且“除非某人曾经被卖为奴,否则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国王—素丹”^③。瑞士多米尼加派修士菲利克斯·法布里(Felix Fabri, 1441—1502)在1483—1484年前往叙利亚和埃及经商期间也遇到了马穆鲁克,他同样将其称为“基督徒的叛徒”。途经加沙时,法布里还与一支马穆鲁克军队相遇,他不仅在其中发现了大量来自匈牙利、西西里和加泰罗尼亚的马穆鲁克,而且还与之攀谈。^④不过,他的这一行为也引起了随行阿拉伯译员的不满,法布里声称,阿拉伯人厌恶马穆鲁克,马穆鲁克也经常压迫阿拉伯人。^⑤

科隆的阿诺德·冯·哈尔夫在15世纪末抵达开罗后也结识了两位德意志马穆鲁克,其中一位来自丹麦,另一位则是巴塞尔的康拉德。哈尔夫与两人相谈甚欢,甚至还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家中饮酒作乐。随后,哈尔夫在他们的带领下觐见了素丹纳赛尔·穆罕默德·本·嘎伊特贝伊(Nasir Muhammad ibn Qaitbay, 1496—1498年在位)。不过,哈尔夫认为马穆鲁克并不喜欢纳赛尔,因为“素丹应该是异教徒出身,而且总是从基督徒的叛徒中选出”^⑥。不仅如此,“在素丹国出生的异教徒不能成为统治者;只有被俘的基督徒叛徒(马穆鲁克)才能统治素丹的国家”^⑦。哈尔夫将这种独特的现象归因于《圣经·创世记》中约瑟的先例:“正如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掉,来到埃及开罗法老这里……约瑟是如此聪明的人,在法老死后,他被选为国王或素丹,以巨大的智慧和平地统治着这片土地……他们没有一个素丹不是先被卖掉的,这一点一直持续至今……”^⑧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哈尔夫甚至将纳赛尔的父亲嘎伊特贝伊(Qaitbay, 1468—1496年在位)视为约瑟的翻版。^⑨

① Pedro Tafur, *Pero Tafur: Travels and Adventures 1435–1439*, pp. 73–74.

② 施尔特贝格出生于今德国南部的下施莱斯海姆(Unterschleißheim),他曾先后在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战役(Battle of Nicopolis)和1402年的安卡拉战役(Battle of Ankara)被俘,其代表作为《旅行手册》(Reisebuch),成书于1460年。

③ Johann Schiltberger, *The Bondage and Travels of Johann Schiltberger, A Native of Bavaria, in Europe, Asia, and Africa, 1396–1427*, trans. Commander J. Buchan Telfer, R. N.,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879, p. 49.

④ Felix Fabri, *Palestine Pilgrims' Text Society*, Vol. II (Part II), trans. Aubrey Stewart, London: Hanover Square, 1893, p. 442.

⑤ Felix Fabri, *Palestine Pilgrims' Text Society*, Vol. II (Part II), trans. Aubrey Stewart, pp. 443–444.

⑥ Arnold von Harff, *The Pilgrimage of Arnold Von Harff, Knight, from Cologne: Through Italy, Syria, Egypt, Arabia, Ethiopia, Nubia, Palestine, Turkey, France and Spain, which He Accomplished in the Years 1496–1499*, trans. Malcolm Let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157.

⑦ Arnold von Harff, *The Pilgrimage of Arnold Von Harff, Knight, from Cologne: Through Italy, Syria, Egypt, Arabia, Ethiopia, Nubia, Palestine, Turkey, France and Spain, which He Accomplished in the Years 1496–1499*, trans. Malcom Letts, p. 172.

⑧ Arnold von Harff, *The Pilgrimage of Arnold Von Harff, Knight, from Cologne: Through Italy, Syria, Egypt, Arabia, Ethiopia, Nubia, Palestine, Turkey, France and Spain, which He Accomplished in the Years 1496–1499*, trans. Malcom Letts, pp. 172–173.

⑨ Arnold von Harff, *The Pilgrimage of Arnold Von Harff, Knight, from Cologne: Through Italy, Syria, Egypt, Arabia, Ethiopia, Nubia, Palestine, Turkey, France and Spain, which He Accomplished in the Years 1496–1499*, trans. Malcom Letts, p. 173.

1513 年,佛罗伦萨学者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在《君主论》中也提到了类似哈尔夫的观点。马基雅维利指出,马穆鲁克王朝完全掌握在军人(马穆鲁克)手中,素丹必须与军人保持友好关系。^①同时,马穆鲁克素丹在继承制度上类似于教皇的选举,马穆鲁克埃米尔就像天主教的枢机团,“因为以前的君主的子孙并不是作为他的继承人,依继承权统治的,王位继承人是享有特权的人们选举出来的人”^②。在马基雅维利完成《君主论》的四年后,马穆鲁克王朝最终被奥斯曼帝国征服。

总体而言,13—16 世纪欧洲文献中的马穆鲁克观念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在马穆鲁克王朝建立之初,暴力交往是马穆鲁克王朝与十字军之间的主要交往形式,欧洲学者或是受宗教情感影响将马穆鲁克视为“基督徒最邪恶的敌人”,或是出于发动十字军的战略需求开启了对马穆鲁克的观察和研究。随着欧洲十字军运动的不断衰落,和平交往逐渐成为双方交往形式的主流,欧洲学者得以深入埃及和叙利亚腹地,并与马穆鲁克展开近距离接触,最终在 16 世纪初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马穆鲁克观念。

二、欧洲文献中马穆鲁克观念的构成

欧洲学者在与马穆鲁克的互动交往中形成的马穆鲁克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且持续深化的过程。学者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类型各异的文献,他们对于马穆鲁克的关注重点也因人而异。但整体观之,这些文献中所体现的马穆鲁克观念基本上是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构成,即马穆鲁克的身份、统治及继承。

(一) 身份: 马穆鲁克是“基督徒的叛徒”

马穆鲁克的身份自第七次十字军东侵后就引起了十字军的注意,英诺森四世获悉马穆鲁克的奴隶身份后,这种观点在费迪乌斯等人的著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细化。然而,自 14 世纪起,欧洲学者在承认马穆鲁克奴隶身份的基础上开始强调马穆鲁克的基督教起源。15 世纪后,这种现象变得愈发普遍,而且基本上在每位学者的著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欧洲学者看来,马穆鲁克本质上属于“基督徒的叛徒”。一方面,马穆鲁克是“堕落”的象征,因为他们在萨拉森人或伪基督徒提供的金钱、权力、肉欲等利诱下背叛了基督教;但另一方面,既然马穆鲁克“曾经是基督徒”,那么就有可能说服马穆鲁克重回基督教,马穆鲁克也有被基督教再次“救赎”的希望。索恩河畔沙隆主教让·热尔曼(Jean Germain)就曾向法王查理七世(Charles VII, 1422—1461 年在位)保证,马穆鲁克都是受洗基督徒或基督徒叛徒的子孙,他们很容易就会皈依基督教。^③从马穆鲁克王朝的角度看,素丹及其麾下马穆鲁克会皈依基督教的想法不仅显得十分荒谬,而且也与史实不合——马穆鲁克并非“基督徒的叛徒”。那么,欧洲学者为何会在 14 世纪后近乎异口同声地强调马穆鲁克是“基督徒的叛徒”?

事实上,马穆鲁克是一个多元族群的混合体。一般而言,伯海里时期的马穆鲁克多是素丹

①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98 页。

②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第 98 页。

③ Hannah Barker, *That Most Precious Merchandise: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in Black Sea Slaves, 1260–1500*, p. 192.

从黑海北岸的钦察草原购买的钦察突厥人^①，布尔吉时期的马穆鲁克多为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除奴隶贸易外，战俘和移民也是补充马穆鲁克的重要方式。例如，拜伯尔斯及盖拉温等素丹就在同伊儿汗国（Ilkhanate, 1256—1335）交战期间以瓦菲迪叶（wāfidīyah）^②的方式吸纳了包括蒙古人在内的大量难民进入马穆鲁克军队。马穆鲁克王朝与伊儿汗国于1323年签订和约后，对于瓦菲迪叶的需求有所下降，加之14世纪中期黑死病的影响，马穆鲁克的族群类型和人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至布尔吉时期，马穆鲁克王朝的马穆鲁克族群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受金帐汗国（Golden Horde, 1242—1502）内战、伊斯兰化及黑死病等因素影响，突厥奴隶人口的供给量大幅减少，马穆鲁克的主体由突厥人转向切尔克斯人；另一方面，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战争中俘虏了大量基督徒，这些俘虏中有相当一部分以奴隶贸易和外交赠礼等形式被送至马穆鲁克王朝。随着奥斯曼帝国扩张步伐的日益加剧，欧洲战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开罗的奴隶市场上。结合法布里与哈尔夫的记载，马穆鲁克王朝在15世纪末至少有来自匈牙利、西西里、加泰罗尼亚、斯拉沃尼亚、希腊、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及德意志的欧洲裔马穆鲁克。

因此，欧洲学者笔下所谓的“基督徒的叛徒”实际上多为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征战中的战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迫皈依伊斯兰教，例如苏切姆和哈尔夫所结识的德意志马穆鲁克在私下里都不遵守伊斯兰教法，说服这部分欧洲裔马穆鲁克回归基督教的确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欧洲裔马穆鲁克只是整个马穆鲁克群体中的少数，且他们大多任译员等低级职位，并未在关键部门任职。诸如哈尔夫所谓的“素丹的所有马穆鲁克都是基督徒中的叛徒”^③，这样的说法显然夸大了欧洲裔马穆鲁克在马穆鲁克王朝的数量和地位。

（二）统治：马穆鲁克的排他性统治

对于欧洲学者来说，奴隶能够成为埃及的统治者显然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更不必说只有马穆鲁克才有资格统治国家。哈尔夫在其著述中明确指出“只有被俘的基督徒叛徒（马穆鲁克）才能统治素丹的国家”^④，他还基于《圣经·创世纪》给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解释，即约

① 钦察突厥人也称奇普恰克突厥人，阿拉伯文献称其为突厥人，俄罗斯文献和拜占庭文献分别称其为波洛维茨人（Polovtsians）和科马洛伊人（Colmalois）。他们是中世纪时期一个存在于亚欧大草原上的突厥游牧民族，曾在阿尔泰地区、东欧大草原、锡尔河流域及西伯利亚等地区都有分布，13世纪蒙古西征开始后，钦察突厥人为蒙古人所征服。参见伯纳德·刘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马肇椿、马贤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年，第149页；Charles J. Halperin, “The Kipchak Connection: The Ilkhans, the Mamluks and Ayn Jalu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63, No. 2, 2000, pp. 229–245.

② 瓦菲迪叶意为“难民”（refugees），在概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所指为狭义，即从蒙古控制下的领土逃亡至马穆鲁克王朝的个人和部落群体。参见 Nakamachi Nobutaka, “The Rank and Status of Military Refugees in the Mamluk Army: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Wāfidīyah,” *Mamlūk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1, 2006, p. 56.

③ Arnold von Harff, *The Pilgrimage of Arnold Von Harff, Knight, from Cologne: Through Italy, Syria, Egypt, Arabia, Ethiopia, Nubia, Palestine, Turkey, France and Spain, which He Accomplished in the Years 1496–1499*, trans. Malcom Letts, p. 178.

④ Arnold von Harff, *The Pilgrimage of Arnold Von Harff, Knight, from Cologne: Through Italy, Syria, Egypt, Arabia, Ethiopia, Nubia, Palestine, Turkey, France and Spain, which He Accomplished in the Years 1496–1499*, trans. Malcom Letts, p. 172.

瑟为马穆鲁克的统治提供了先例。相较而言,约瑟和马穆鲁克的经历的确具有部分相似点。首先,约瑟是为自己的哥哥们所卖,而马穆鲁克也存在被亲属贩卖的现象;其次,约瑟和马穆鲁克都是作为奴隶从自己的原籍地被卖到埃及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再次,约瑟通过为法老解梦升任埃及宰相,马穆鲁克可以通过军功晋升为埃米尔乃至素丹;最后,约瑟经历磨难后与哥哥们尽释前嫌,还将家人接往埃及居住,而马穆鲁克也有将其亲属接往埃及的情况。^①

但是,通过约瑟解释马穆鲁克的统治并非欧洲学者的首创。众所周知,约瑟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中共有的典故人物,《古兰经》中的优素福即为约瑟,穆斯林学者也有使用优素福的先例。例如,阿富汗历史学家哈杰·西拉杰·朱兹贾尼(Minhaj al-Siraj Juzjani, 1193—约1266)^②就在《纳赛尔传》(*Tabaqat-i Nasiri*)中将印度德里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Dynasty, 1206—1290)的第三任素丹沙姆斯丁·伊勒杜米什(Shams ud-Din Iltutmish, 1211—1236年在位)类比为优素福,因为伊勒杜米什也是遭到兄弟们嫉妒而被卖至印度为奴。^③就叙利亚—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而言,伯尔古克与约瑟的经历最为相似。根据伊本·塔格里·比尔迪(Ibn Taghri Birdi, 1411—1470)^④在《闪耀群星:埃及与开罗列王》(*al-Nujūm al-zāhira fī mulūk Miṣr wa'l-Qāhira*)^⑤中的记载,身为切尔克斯人的伯尔古克在少年时被奴隶商人奥斯曼·本·穆萨菲尔(Uthman ibn Musafir)卖至埃及为奴,伯尔古克功成名就后通过穆萨菲尔将他的父亲、姐妹及外甥们接至开罗并赐予高官厚禄。^⑥在登上素丹大位后,伯尔古克还于1399年为优素福兄弟们的圣墓增设了瓦克夫(waqf)以彰显自己的统治合法性。^⑦

因此,欧洲学者和穆斯林学者虽然都运用了同一位典故人物的事迹来解释马穆鲁克的统治,但双方所得结论却截然不同。对欧洲学者而言,使用约瑟的先例是为了从宗教角度论证“只有‘基督徒的叛徒’才能成为统治者”;而穆斯林学者对于优素福的理解则来自《古兰经》第12章21节:“我这样使优素福在大地上获得地位,以便我教他圆梦。真主对于其事务是自主的,但人们大半不知道。”^⑧换言之,欧洲学者此举是为了凸显马穆鲁克统治的排他性,而穆斯林学者则是为了给马穆鲁克的统治增添宗教合法性。

结合史实来看,欧洲学者的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马穆鲁克统治特征中的排他性却趋于绝对化。事实上,马穆鲁克王朝作为西亚北非地区一个完全由军事奴隶贵族建立的政

① 参见 Anne F. Broadbridge, “Sending Home for Mom and Dad: The Extend Family Impulse in Mamluk Politics,” *Mamlūk Studies Review*, Vol. 15, 2011, pp. 1–18.

② 朱兹贾尼出生于今阿富汗古尔(Ghor),后相继移居至乌奇(Uch,今巴基斯坦境内)和德里,其代表作为《纳赛尔传》,该书记述了古尔王朝(Ghurid Dynasty)的历史。

③ Peter Jackson, *The Delhi Sultanate: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3.

④ 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是马穆鲁克王朝后期重要的历史学家,出身于埃及的马穆鲁克家庭,曾经师从麦戈利齐。

⑤ 《闪耀群星:埃及与开罗列王》是伊本·塔格里·比尔迪最具代表性的编年史著作,包含从阿拉伯人征服直到1467年的历史,尤其侧重于对15世纪马穆鲁克王朝宫廷斗争的记述。

⑥ Abu'l-Maḥasin ibn Taghri Birdi, *History of Egypt 1382–1469 A.D. Part I, 1382–1399 A.D.*, trans. William Popper,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4, pp. 2–5.

⑦ Abu'l-Maḥasin ibn Taghri Birdi, *History of Egypt 1382–1469 A.D. Part I, 1382–1399 A.D.*, trans. William Popper, p. 174.

⑧ 《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

权,^①其统治主体虽然由马穆鲁克组成,但马穆鲁克在对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过程中并未排除其他社会阶层的参与。马穆鲁克身为“执剑人”主要控制着王朝军事体系及行政体系中的高层部分,行政体系的中层及基层部分则由作为“执笔人”的平民阶层和普通马穆鲁克构成,而司法体系几乎被以乌里玛(ulama)阶层为代表的“戴头巾的人”垄断,马穆鲁克少有参与。因此,马穆鲁克的统治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权力网络,涵盖多个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其统治并不仅仅依赖于军事力量,还在于有效整合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而在保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也为其他非马穆鲁克群体提供了参与治理的机会。

(三) 继承: 马穆鲁克的非世袭继承

马穆鲁克的继承是马穆鲁克排他性统治的逻辑延续,正是因为统治者必须是“基督徒的叛徒”,所以他们的子孙也不能统治。塔富尔很早就意识到了权利在马穆鲁克代际关系中存在的递减现象,哈尔夫则提出了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马穆鲁克之子非但永远不能成为统治者,而且素丹也会在马穆鲁克死后没收其所有财产,除非得到恩准,否则马穆鲁克之子不能继承父亲的任何遗产,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出身。^②马基雅维利在16世纪初对马穆鲁克的记载基本上遵循了同样的逻辑,马穆鲁克王朝和教皇国一样,其在本质上是一种贵族式的寡头政治——教皇由枢机团选举产生,而素丹则由埃米尔选举产生,马穆鲁克之子同样被排除继承在外。

事实上,欧洲学者笔下的“马穆鲁克之子”正是马穆鲁克文献中的“马穆鲁克后裔”(awlād an-nās),即外国军事精英、获赎身的马穆鲁克的后裔(大约持续至第四代)。^③在马穆鲁克王朝的历史中,马穆鲁克后裔是一个流动性较强的社会群体,介于叙利亚—埃及地方社会和马穆鲁克社会之间。对于在马穆鲁克王朝停留时间较短的欧洲学者而言,想要完整观察到马穆鲁克后裔的多样性社会角色着实是一件难事。但即便如此,欧洲学者还是抓住了马穆鲁克后裔的一大特点,也就是他们不能继承父辈的权利。从马穆鲁克制度的角度看,欧洲学者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虽然在马穆鲁克王朝历史上的确存在例外,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马穆鲁克总体上维持着非世袭的原则。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欧洲学者眼中的非世袭性是与马穆鲁克的“他者”身份和排他性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这三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塑造了一个与叙利亚—埃及地方社会完全隔绝的马穆鲁克社会。马穆鲁克被视为一个封闭性极强的“军事种姓”(Military Caste),他们非但不接纳自己的后代,甚至连彼此之间的暴力冲突也无法将其打破。哈尔夫在描述素丹王位继承战争时就声称:“这场战争与国家无关,国家也与战争无关,只有马穆鲁克自己与他们的派系之间相互争斗。”^④在这种情况下,马穆鲁克作为不可逾越的军事阶层统治着其他阿拉伯穆

①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第137页。

② Arnold von Harff, *The Pilgrimage of Arnold Von Harff, Knight, from Cologne: Through Italy, Syria, Egypt, Arabia, Ethiopia, Nubia, Palestine, Turkey, France and Spain, which He Accomplished in the Years 1496–1499*, trans. Malcom Letts, p. 193.

③ Anna Kollatz, “Introduction: On to New Horizons—Trackling the Mamluk’s Descendants,” in Anna Kollatz, ed., *Mamluk Descendants: In search for the awlād al-nās*, Bonn: Bonn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9.

④ Arnold von Harff, *The Pilgrimage of Arnold Von Harff, Knight, from Cologne: Through Italy, Syria, Egypt, Arabia, Ethiopia, Nubia, Palestine, Turkey, France and Spain, which He Accomplished in the Years 1496–1499*, trans. Malcom Letts, p. 174.

斯林，而马穆鲁克社会则处于马穆鲁克统治阶层与地方被统治阶层之间的二元对立状态。

然而，无论是伯海里时期突厥马穆鲁克还是布尔吉时期的切尔克斯马穆鲁克，马穆鲁克和非马穆鲁克之间都没有绝对的“种姓隔绝”。马穆鲁克对于叙利亚—埃及当地社会的统治显然离不开当地人士的配合，开罗和大马士革等地的平民参与马穆鲁克政治的情况时有发生。^①与此同时，马穆鲁克和马穆鲁克后裔也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之外有所成就，拜伯尔斯·曼苏里（Baybars al-Manṣūrī，？—1325）、伊本·杜戈玛戈（Ibn Duqmāq，1349—1407）及伊本·塔厄里·比尔迪等历史学者正是如此。^②“简言之，不存在严格和明确定义的单世代贵族，这是一种社会谬论。”^③

三、欧洲文献中马穆鲁克观念产生的原因

从 13 世纪中期至 16 世纪初，马穆鲁克在欧洲学者眼中是一个既令人心存畏惧却又充满未知的形象。一方面，马穆鲁克是武力强劲的十字军终结者，即便是驰骋亚欧大陆的蒙古人也未能将其征服；另一方面，马穆鲁克在驱逐十字军后并未进攻欧洲，双方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鲜生战端。从欧洲学者的著述中也不难看出，马穆鲁克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多元的动态性过程。那么，马穆鲁克观念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首先，欧洲学者的马穆鲁克观念实质是中世纪早期基督徒伊斯兰观念的历史延续。事实上，7 世纪的基督徒在面临阿拉伯征服时通过《圣经》和基督教神学来理解伊斯兰教的崛起，而 13 世纪的基督徒在遭遇十字军失败的情况下再次使用了同样的方式来理解马穆鲁克。从广义上讲，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元叙事是线性的，它以起点（创世）和终点（审判日）为框架，虽然历史的终点是预设的，但通往终点的道路却充满了考验和磨难，上帝和撒旦的善恶阵营通过对人间的干预相互斗争。^④在这一过程中，萨拉森人和马穆鲁克显然被归入后者，基督徒与他们的斗争自始至终都具有宗教与世俗的双方意义。不仅如此，中世纪的历史叙事往往以牺牲人的自由意志为代价来强调上帝的全能，不仅地震等自然现象被解读为宗教征兆，就连军事成败等人为事件也被视为上帝对其子民行为的肯定或否认。^⑤因此，无论是 7 世纪伊斯兰教崛起还是 13 世纪马穆鲁克的成功，基督徒的失败与否都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萨拉森人和马穆鲁克

① 参见 Irmeli Perho, “Climbing the Ladder: Social Mobility in the Mamluk Period,” *Mamlūk Studies*, Vol. 15, 2011, pp. 19–35; Amina Elbendary, *Crowds and Sultans: Urban Protest in Late Medieval Egypt and Syria*,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5.

② 拜伯尔斯·曼苏里是伯海里王朝时期的历史学家，原为马穆鲁克素丹盖拉温的马穆鲁克，被称为“穆斯林历史思想的精髓”，而伊本·杜戈玛戈和伊本·塔厄里·比尔迪则属于马穆鲁克后裔。

③ Ulrich Haarmann, “Joseph’s Law—The Careers and Activities of Mamluk Descendants before the Ottoman Conquest of Egypt,” in *The Mamluks in Egypt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eds., Thomas Philipp, Ulrich Haarmann,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4.

④ Paul T. Levin, *From “Saracen Scourge” to “Terrible Turk”: Medieval, Renaissance, and Enlightenment Images of the “Other” in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07, p. 108.

⑤ Paul T. Levin, *From “Saracen Scourge” to “Terrible Turk”: Medieval, Renaissance, and Enlightenment Images of the “Other” in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p. 116.

是上帝用来考验或惩罚基督徒的工具。虽然基督徒不幸遭遇惨败,但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信仰,以确保他们在上帝指引的道路上前行。正是在这种强化“自我”的过程,一个极端负面的“他者”也在同一时间被塑造,并且根据历史发展的变化,“他者”的具体指代对象由7世纪的萨拉森人转换为13世纪的马穆鲁克。

其次,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为14—16世纪欧洲文献中的马穆鲁克观念变迁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欧洲学者对马穆鲁克的负面观念。一方面,自1291年以来,马穆鲁克王朝与欧洲除在塞浦路斯王国问题上发生过短暂的暴力冲突外,^①和平交往在双方的互动中占据主流。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从14世纪起开始替代马穆鲁克王朝成为欧洲的主要威胁,欧洲学者也将注意力转移至更具威胁性的奥斯曼土耳其人。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对欧洲产生了极大震撼,欧洲各国出现了大量有关奥斯曼土耳其人血腥屠杀的传闻,奥斯曼土耳其人因此被贴上了“新野蛮人”“最凶猛的野兽”等标签,^②而马穆鲁克先前极端负面形象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淡化。

再次,中世纪晚期地中海奴隶制隐含的宗教意识形态影响。相较于作为“他者”的萨拉森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马穆鲁克的特殊性体现在其社会属性上,即马穆鲁克的奴隶身份。从宗教的角度看,由于奴隶必须皈依主人的宗教,所以奴隶贸易被视为肉体 and 灵魂的双重交易,奴隶制与圣战或传教活动一样都是为了给“正确的”宗教获取灵魂的一种方式,基督徒很容易将此视为一场“零和博弈”,任何在博弈中皈依伊斯兰教的奴隶都必然会减少基督徒的数量。^③许多欧洲学者据此将马穆鲁克视为穆斯林的“阴谋产物”,萨拉森人和伪基督徒通过各种方式“利诱”基督徒并使其“堕落”为马穆鲁克。这种意识形态不但强化了马穆鲁克是“基督徒的叛徒”的身份认知,而且使得欧洲学者“盗用”了原本属于马穆鲁克的成就。例如,15世纪前往大马士革的欧洲学者确信,大马士革城堡并非由作为穆斯林的马穆鲁克建造,而是来自佛罗伦萨“基督徒的叛徒”的杰作,马穆鲁克素丹伯尔古克是法国人,他的城墙上装饰着与法兰西王国一样的百合花纹章,将马穆鲁克视为“曾经的基督徒”或“潜在的基督徒”不仅使得败于马穆鲁克手下变得可以容忍,而且在奥斯曼帝国的现实威胁下,欧洲学者甚至能将马穆鲁克想象为抵抗奥斯曼帝国的盟友。^④

最后,欧洲裔马穆鲁克在欧洲马穆鲁克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有重要影响。从欧洲马穆鲁克观念的产生及形成途径看,其中既有通过直接接触而独立产生的马穆鲁克观念,也有通过夸张想象而建构的马穆鲁克观念。但总体观之,欧洲学者对马穆鲁克的接触认知大多不是直接源于占据马穆鲁克主体的突厥人马穆鲁克或切尔克斯人马穆鲁克,相反,占据少数的欧洲裔马穆鲁克是欧洲学者主要的信息来源,他们对欧洲马穆鲁克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欧洲裔马穆鲁克为欧洲马穆鲁克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大量信息,对于促进东西方交往具有推动作用。

① 马穆鲁克素丹伯尔古克曾于1424—1426年三征塞浦路斯王国,并于第三次远征中一举俘虏塞浦路斯国王雅努斯(Janus, 1398—1432年在位),塞浦路斯王国自此沦为马穆鲁克王朝的附庸,直至其在1489年被威尼斯人占领。

② 宋保军:《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观念探析》,《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

③ Hannah Barker, *That Most Precious Merchandise: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in Black Sea Slaves, 1260–1500*, p. 189.

④ Hannah Barker, *That Most Precious Merchandise: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in Black Sea Slaves, 1260–1500*, p. 190.

从构成上看,欧洲裔马穆鲁克大都是来自欧洲与伊斯兰世界接壤的巴尔干或伊比利亚半岛等地区的社会下层民众,他们多因战乱贫困等因素被卖至埃及,此后又亲身参与马穆鲁克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活动。他们与马穆鲁克互动交往中所产生的马穆鲁克观念为欧洲学者提供了大量珍贵信息,对于欧洲人认识马穆鲁克、穆斯林乃至伊斯兰世界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欧洲裔马穆鲁克于整个马穆鲁克阶层而言只是一群地位低下的少数群体,他们对于马穆鲁克的认识本来就有一定的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欧洲裔马穆鲁克在历史上很少留下自己的著述,他们的马穆鲁克观念是通过那些抵达马穆鲁克王朝的欧洲学者进行了间接转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裔马穆鲁克自身也属于“被表达”的对象,这种“先天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洲学者对马穆鲁克的片面化认知。

概言之,13—16 世纪欧洲文献中的马穆鲁克观念是在双方巨大差异的背景下形成的,它既体现了欧洲基督徒与马穆鲁克在不同阶段的交往过程,也是欧洲基督徒在认识伊斯兰过程中多重构建的结果。

结 语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对峙”的观念和“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对峙”的观念并非亘古有之,而是逐渐产生和演绎的结果。马穆鲁克王朝与欧洲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对峙是其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纵观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斗争历史,13—16 世纪是早期现代欧洲“自我”观念和“他我”观念形成和演变的关键时期之一,是欧洲开始被界定为一个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身份的时期。在不断与“他者”形象的对比中,欧洲学者逐渐建构起对自身观念和道德标准的认识,而萨拉森人、马穆鲁克、奥斯曼土耳其人则成为其重要的“他者”形象。

在 13 世纪十字军东侵的背景下,以伊斯兰世界保卫者自居的马穆鲁克王朝逐渐强大并在叙利亚地区接连收复失地;相比之下,欧洲十字军不仅节节败退,而且被迫处于守势。在种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下,欧洲学者对马穆鲁克表现出强烈的敌视,在将马穆鲁克贬为“魔鬼的奴隶”“基督徒最邪恶的敌人”的同时,却将自身想象为崇高、仁慈、虔诚的正义形象。然而自 14 世纪起,马穆鲁克王朝与欧洲鲜生战事,而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的迅速扩张却引发了欧洲人的极大恐慌。欧洲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暴力交往及其与马穆鲁克的和平交往形成了鲜明对比,奥斯曼土耳其人因此被贴上了“新野蛮人”“最凶猛的野兽”等标签,而马穆鲁克一方面以“基督徒的叛徒”的身份在埃及和叙利亚实施着排他性和非世袭性的异类统治;另一方面又被部分欧洲学者臆想为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潜在盟友”。这种观念既反映了欧洲学者对马穆鲁克的偏见与蔑视,也是欧洲在面临现实威胁时寻求自我定位时的困惑与不安。至 16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最终完全替代马穆鲁克王朝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头号强敌,“基督徒最邪恶的敌人”自萨拉森人转移至马穆鲁克后,最终于 16 世纪被冠于奥斯曼土耳其人身上。由此可见,在早期现代欧洲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认知的重要历史阶段,马穆鲁克王朝在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物。

(责任编辑:郭丹彤)